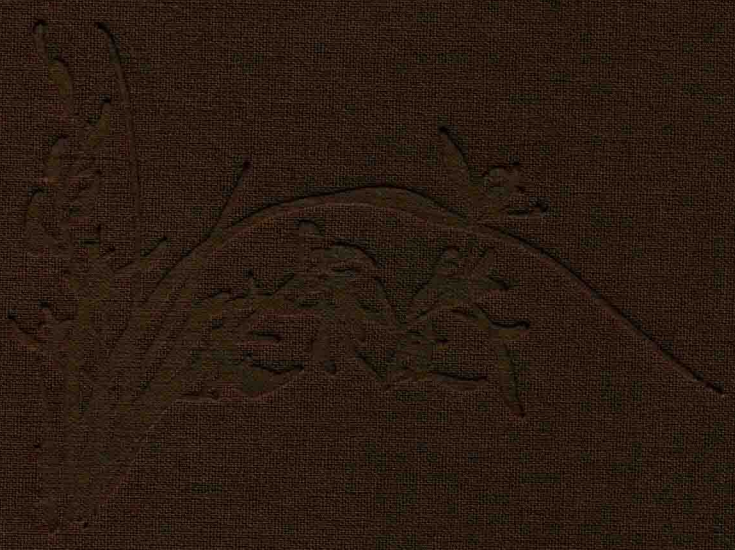
莫礪鋒文集

卷二



凤凰出版社

凤凰传媒
PHOENIX MEDIA

莫礪鋒文集

卷二

古典文学论集（上）

凤凰出版社

目 次

古典文学论集（上）

“文学史学”献疑 …… 3
浅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 …… 9
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 …… 40
《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 …… 54
靖节高标的最早颂歌
——读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 …… 66
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 …… 85
“江郎才尽”新解
——读江淹《恨赋》、《别赋》 …… 107
从《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 121
南朝山水文初探 …… 134
论唐诗意象的密度 …… 148
论初盛唐的五言古诗 …… 168
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 …… 192
杜甫的文化意义 …… 209
论杜甫的文学史观 …… 223
论杜甫是文以载道的典范 …… 234
文学史视野中的杜甫排律 …… 258

穿透夜幕的诗思
——论杜诗中的暮夜主题 …… 284
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 …… 302
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
——与傅光先生商榷 …… 320
杜甫对诸葛亮的赞颂 …… 340
杜诗"伪苏注"研究 …… 350
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 …… 378
宋人校勘杜诗的成就及影响 …… 412
宋人杜诗注释的特点与成就 …… 428
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 …… 443
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 …… 458
中唐诗坛上的韩潮柳江 …… 487
大家阴影下的焦虑
——唐诗人薛能论 …… 505
论晚唐的咏史组诗 …… 523
晚唐诗风的微观考察 …… 539
论晚唐五代词风的转变
——兼论韦庄在词史上的地位 …… 561
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 …… 576

古典文学论集（上）

“文学史学”献疑

“文学史学”这个名词总令人觉得有点别扭，倒不是由于它听起来拗口，而是由于对它的意义不甚了然。旁观其他历史学科，似乎没有这样一种“亚学科”。与文学史性质相近的学科为数很多：科技史、艺术史、哲学史、史学史等等，但似乎不曾听说有什么“科技史学”、“艺术史学”。哲学史与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繁盛程度并不亚于文学史，也未见有人在它们后面再缀上一个“学”字。那么，为什么唯独文学史要派出生一门“文学史学”来呢？是不是文学史具有独特的学科性质呢？

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的历时性的存在。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的影响如何”，就是取这种意义。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是一种主观的叙述、阐释和评价。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就是取这种意义。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第4章中所论述的“文学史”是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的一种研究方式，当然应是指第二种意义而言。那么，所谓“文学史学”是针对哪一种意义的文学史呢？显然，这不可能是第一种，否则的话，如此产生的“文学史学”就是指以文学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也就成了第二种意义的“文学史”。即使这种研究工作偏重于理论的抽绎，也只须称之为“文学史理论”，它仍可被包括在“文学史”之中，根本无需画蛇添足地缀上一个“学”字。所以，“文

学史学”就一定是关于第二种意义的“文学史”的，也就是说，它应是探讨如何研究、撰写文学史，或是对已有的文学史著作进行分析、总结的一门学科。然而，对于编写文学史的历史尚不足百年的中国来说，建立这门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从著作的数量来看，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已经蔚为大国了。据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的《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 300 种，其中仅属通史性质的即达 50 余种，真可谓洋洋大观。然而著作数量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学科水平的提高，草创时期的那些文学史不用说了，因为那时连什么是文学尚不清楚，当然谈不上什么史识和史观。即使在人们对文学史的性质比较清楚以后，文学史著作在学术上的进步仍是步履维艰。而文学史著作往往具有教科书性质这一事实，更使陈陈相因成为该学科的整体性缺点。我们试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问世的几十部通史浏览一过，便可发现许多声明适用于师范院校、专科学校、电视大学等不同层次的文学史教材，其实都是游国恩史和文学所史的改编本而已。所以真正有资格成为“文学史学”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寥寥无几。由这么几部著作所提供的学术积累实在是很有限的，许多概念和命题还不够明确，学术规范也不够严格。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门“文学史学”，是否太匆忙、草率了一点呢？

近十多年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都渴望着在总体水平上有所突破，写出超越前人著作的新著来。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理想中的超越，于是便寄厚望于方法的更新，适逢海禁初开，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供需双方一拍即合，方法热便应运而生。这种不局限于本土学术的开放心态和谋求理论指导的学术意向本是好事，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有两方面的失误：一是人们往往带着迫不及待的焦虑心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饥不择食、急病乱投医的草率态度，有的甚至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便自以为已经探骊得珠。二是人们对理论与方法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值，甚至

认为只要方法一新便可顷刻点铁成金，势如破竹，而忽视了细致的本文研读和深入的专题研究。结果是不断有人宣称发现了很好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从而可以实现文学史研究的突破了。在一些著作的序言中往往有气壮如山的宣言，可是在正文中却难以找到能体现其宣言的实质性内容。例如有一部《中华文学五千年》在序言中宣称：“今天通行的文学史读本的体系，不仅是陈旧的，也是不科学的，没有光彩的。我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废除旧的体系，走一条新的文学史研究的路子，建立一个新体系。”这样的宣言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可是当我读了此书的前二卷后，却大失所望。试看其第一卷，共分四个部分，即“神话的时代”、“诗歌的时代”、“散文的时代”（上，诸子散文）、“散文的时代”（下，史传散文）。如此的“新体系”似乎仅仅是旧体系的改头换面，况且此书将《九歌》归入“诗歌的时代”，将《离骚》、《九章》归入“散文的时代”，编排很不合理，在具体论述中对楚辞学、诗经学的最新学术成果吸收很少。如此创新，实在没有多少学术意义。

那么，撇开上述情况不论，或者说假如我们克服了上述失误之后，能不能把提高文学史学科水平的希望寄托于借鉴西方理论呢？

我对此不抱很乐观的态度，原因有二：

首先，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走过的历程是不同的，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外在驱动因素到语言、文体等内在嬗变因素，两者都相去甚远。这样，基于一种文学现实的文学理论能否适用于另一种文学，一些重要的概念或术语能否互相转换，是很可怀疑的。例如中国诗学中的意境、格调，西方诗学中的张力（tension）、肌质（texture），用于各自的文本分析时颇为有效，却很难在对方的批评中付诸实用。至于那些对西方文学都缺乏普适性的新奇理论，我们更不能指望它们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起到神奇的促进作用。

其次，西方文学理论的多数体系主要是用于共时性的文学研究的，它们虽然可以运用于文学史研究的局部工作，像细致的文本分析等，但是对于历时性质的文学史自身却并无多大指导意义。高友工、

梅祖麟的《唐诗的句法、用词和意象》、《唐诗中的语意、隐喻和典故》可能是运用西方理论分析唐诗的比较成功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如果把两文中所举的作品都换成宋诗(这点并不困难),结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那么,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唐宋诗之沿革异同这类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问题,恐怕就难以奏效了。

如果我们很谨慎地借鉴西方理论中有关文学史的部分,又努力地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中总结规律,从而建立了比较理想的"文学史学"之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能否由此就出现飞跃呢?

我对此也不抱太乐观的态度。

"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学术界已经响了好多年了,而且在人们明确提出这个口号之前,重写文学史早已悄悄地开始了。历史学科本来就具有当代性,任何分支的历史都应不断地重写。早在21世纪初期,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提倡"新史学"时就说过"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完好的、比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经陈旧的历史"。话说得平淡无奇,却是不易之论。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加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重新编写文学史,才能体现其当代性和主体性。正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也应有一代之文学史。在目前的关键时刻,似乎迫切需要"文学史学"为实际的编写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然而我认为,文学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提高其学术水准的关键在于实际的操作,理论的探讨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一则任何理论的进步都必须以专题研究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二则从理论的认识转化为实际的操作仍有很大难度,几乎可说是"知易行难",所以"文学史学"的重要性仍是处于第二位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是最流行的、

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以这三部书为对象的。人们对三书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两句话，对此大家的看法相当一致。几乎可以说，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文学史学”倒已经有点眉目了。因为既然已经看清了缺点，那么它们的对立面当然就是应予肯定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给予更正确的解释。同时应对文化、社会心理等其他文学背景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更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流程给予最大的关注。我们还应该放弃罗列作家、作品的拼盘式结构，而把理清文学发展演变的线索作为主要的论述方式，等等。然而，正像俗话所云，“空说容易动手难”，要将这些明白清楚的观念付诸实践，却绝非易事。试以后一点为例。早在20世纪40年代，钱基博就已指出：“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可是文学史的线索不像数学中的曲线那样，可以用图像或公式精确地表示出来。文学史的轨迹是一条乃至数条没有一定规律的、时断时续的曲线，要想用文字把它表达清楚，首先应把一些最重要的轨迹点确定位置，也就是要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充分的论述，并把它们放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然而仅仅有几个孤立的点尚不足以体现曲线的全貌，于是又必须兼顾构成文学整体风貌的次要作家、作品，并理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即使仅仅在一种文体的范围内已很难兼顾无遗而又主次分明，更何论包含形形色色、互相影响、演变又不尽同步的诸文体的通史型文学史！

再举一例。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是撰写文学史时无法回避

的问题。现有的大多数文学史都是按朝代来分期的,大家对此也早已啧有烦言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的不满是有充足理由的。文学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性,怎么会和封建帝王改朝换代一一重合呢?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云翼在《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就已说过:"有许多人很反对用政治史上的分期,来讲文学。他们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说文学的变迁往往不依政治的变迁而变迁。"郑振铎等人也写过论文讨论此事。也就是说,就"文学史学"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确的:我们当然应该依据文学自身的历史而不应依朝代来进行文学史分期。可是直到今天,又有哪种著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上述几点都是很浅显的道理,在有些学者眼中也许还不具备理论的品格,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史学"要深奥、玄妙得多。然而,既然如此浅显的原则都难以付诸实践,那些深奥、玄妙的哲理性原则又怎样运用于实际操作呢?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史教学的教师,我非常希望看到突过前人的文学史新著。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我也非常希望从"文学史学"得到理论的指导。但是我更希望大家不要空谈"文学史学",而应亲自撰写文学史,至少也应以某些文学史专题为具体对象,再抽绎出理论来,就像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写《普勒的〈大自然的雄伟〉》、伏狄卡写《现代捷克散文的开始》那样。否则的话,那些费尽心力建立的"文学史学"的理论体系也许会成为空中楼阁。

但愿我的忧虑仅仅是杞忧。

浅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

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产物，它既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部分，也与整个社会文明的其他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把文艺视为促进社会教化的有力手段。亚里斯多德等西方古代哲人也很重视文艺对社会的教益作用。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文明史的实际进程都证明了文学艺术在促进社会文明、陶铸民族文化性格等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如今，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如何发扬文学艺术在促进社会文明方面的积极作用已成为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此外，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面对越来越大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如何应对新的形势，使我们的文学艺术既保持优秀的民族传统又适应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也是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华文化也许不是地球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类文化，但它却是世界上惟一历经五千年发展过程而从未中断的灿烂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身上烙下深深印记的民族文化基因，是记录着中华民族风雨历程的鲜活的心灵史，也是昭示着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宝贵的启示录。而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精华部分，而且是最为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直观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生动地表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态度，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它就像中华大地上的九曲黄河和

万里长江,即使受到险滩礁石的拦截仍然一脉相承、奔流不息。所谓古代和现代,只是人们为了便于思考和论述而构想出来的概念。事实上"抽刀断水水更流",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这条长河从未在所谓的"古代"和"现代"的交界处停下脚步,就像它曾经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样,它也必然会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予以论述,从而揭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核心价值以及它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产生深刻影响的学理根据。

一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地理和民族背景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的起源都比中华文明更早。可是中华民族自古繁衍生息的神州大地虽然幅员辽阔,但西有帕米尔高原的高峻山岭,东有太平洋的浩瀚波涛,它们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从而基本隔绝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的交流。因此,中华文明是在神州大地上独立自主地诞生、发育起来的人类文明,它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也就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它以独一无二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正是这些特征使它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历程而从不间断地生存至今,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它以宽容的胸怀不断接纳异质文化的因子而仍然稳固地保持着自身的本质。

古代中国的疆域经常处于扩展和收缩的变动之中,但大致说来,由秦朝统一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所实际统治的疆域体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秦朝的疆域北起河套地区、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日的越南东北部,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在唐朝和元朝,中国的北界远达今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清朝的疆

域则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北起萨彦岭、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它的大部分疆土处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气候温和，季风发达，主要地区温暖季节与雨水充沛的季节同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中国疆域辽阔，国土内部包括各种不同的地理区域，境内既有天山、阴山、昆仑山、秦岭、南岭等东西走向的山脉，又有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太行山等南北走向的山脉，再加上长江、黄河、淮河、辽河等江河流经其间，便形成地理区域的自然分界线，所以古代中国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存在着游牧、渔猎等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生产形态。正如马克思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化，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①]古代中国便是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生产形态多样、产品种类齐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这样的经济基础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农耕生产是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的，尤其是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之后，从事农耕的人们积累了精耕细作、保持地力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他们愿意世世代代居住在相对稳定的区域之内，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与追逐水草而游牧或不远千里而经商的人们相比，从事农耕的中华先民们格外具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他们格外向往安定、质朴的生活形态。相传在尧的时代，有一位老农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就是古代先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的生动写照。即使对整个民族而言，平稳、安定也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事农耕的民族即

①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61 页。

使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也总是以守卫自身的疆土为最终目标,在战事上往往以防御为主。《史记》记载周王朝的兴起过程是:"(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①]这是中华先民最拥护的国家政治模式,它不是用武力征服的血腥手段来建立的政权,而是经过充满情感的感化过程而聚拢起来的民族群体。既然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的两大因素是土地与劳动力,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争夺的目标既是土地,也是人口。无庸置疑,春秋战国时代战火连绵,孟子曾一针见血地批判说"春秋无义战"[②],便是由于诸侯国运用战争手段来争夺土地和人口。显然,这是不符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那么,按照儒家理想的政治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怎样才能开疆拓土而成为幅员辽阔的统一王朝呢?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③]这种信史化的叙述也许出于儒家的增饰,但至少反映出中华先民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判断,这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古代中国的农耕生产虽然都是规模很小的小农经济,但华夏先民从事农耕的地域范围却相当辽阔,这个地理背景使当时的农耕生产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来自自然界的水旱灾害,二是来自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掠夺。虽然中华大地的基本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在如此辽阔的地理区域内,局部性乃至大面积的水旱灾害还是经常会发生的。所谓"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④],便是严重的天灾给先民们留下的集体记忆。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对付旱

---

①《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页。

②《孟子·尽心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2773页。

③《论语·季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2520页。

④《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0页。